重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考据传统

——读《义和团史事考》

程 歉　许 蕾

我们欣喜地读了林华国先生的新著:薄薄的一本,书名同装帧一样的朴实无华——《义和团史事考》(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凝结了作者十数年辛勤劳动的考证义和团有关史实的专著。

在某种意义上讲,人们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认识,从一开始就带有考据色彩。1899 年 9 月正当这场运动刚刚勃起时,直隶吴桥县知县劳乃宣,就写下了著名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这篇曲解史实,将义和拳简单地混同于白莲教,旨在为清朝当局的镇压政策提供历史依据的所谓"考证"之作,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此后 80 年的史学界。人们关注对义和团的考证并非偶然。由于这场运动所特有的骤发性、分散性、复杂性和神秘性,一时间如山洪奔泻,旁流杂出,扑朔迷离,因而多年以来,有不止一代的研究者,对其采取了某种区别于诸如太平天国史、辛亥革命史等领域的研究方法,即将研究视角首先集中在那些最能反映运动复杂性的课题上,以若干难点、疑点入手,进行比较细致的史料考证、史实分析和比较深入的理论概括,并经过不同学术见解的争鸣和互补,求得对各该专题的逐个突破、有序推进,以利于从历史的顺向和逆向,从事件的正面和反面,从社会变动的各个层次去揭示义和团运动的真实面貌和内在规律。《史事考》一书,就是反映了如上学术状态和研究方法的代表作之一。

本书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就是突破了史学界长期以来将帝国主义和清王朝归为一方,将义和团民众归为另一方,从而形成的"帝国主义侵略、清王朝出卖——义和团抗争"的研究公式,而是从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那种特定的社会动荡、风云突变的历史大背景着眼,深入研究了国际国内如上三种势力之间的错综复杂、风波迭起的交叉互动关系,从中把握当年特殊的政治格局和历史走向。作者将义和团运动史划分为庚子(1900)战前和庚子战争这样两大发展阶段,指出 1898 年至 1900 年 6 月以前的拳民抗争风暴初起于山东、直隶一带时,清朝中央和地方当局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出于统治集团的本性,对运动采取的是相当鲜明的镇压政策,而不是如有些论者所说的宽容忍让的政策,仅仅是由于侵略者旨在使中国全盘殖民地化的意图同清政权要保持其自身半独立地位的欲求发生扞格,以及直东两省当局在军事举措上的某些歧异,才使这项政策在实施时忽紧忽松,政令不一,不可能将四处迸发并同广袤的乡土社会融为一体的拳坛扼杀于初起时期。如上状态促成侵略者进一步加大的对清王朝的压力,反而导致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和反弹,从而为运动向京津地区推进提供了有利的时空条件。但义和团的实力在总体上呈分散、自发状态,更缺乏象太平天国北伐军那种攻坚能力,并没有形成如有些研究者所说的足以威胁清王朝的力量。因此,在运动第二阶段即庚子战争中,迫使清王朝"宣战"的主要动因不是分散进入都城的拳民,而是由于帝国主义袭击大沽炮台而急剧凸现的民族矛盾。在短暂的民族自卫战争中,清朝政府具有复杂多面的政策动向,它并非学术界长期认为的

“真投降，假备战”，而是无可奈何的“一边抵抗，一边求和”；它对义和团也不仅仅是利用和出卖，而是形成过暂时和松散的联合御侮局面。战争中，北京攻打使馆和天津抗击侵略的性质、作用虽然有别，但清军均为战斗主力，义和团民则在各种场合表现了英勇的献身精神和起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至北京陷落，政治格局才进一步发生变化，清政府对外彻底投降，而义和团的余波则相应表现为“灭洋”和抗官并举的新姿态。

写一本有独到见解的书难，而写一本同一批著名史学家的学术观点相异、自成一家之言的书更难。《史事考》的作者以足够的理论勇气和历史责任感，展现了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基本上澄清了纷如乱麻的一系列史实。这是该书最突出的建树。

一本蕴含了丰硕成果的史著，需要著述者具有充满活力、富有弹性的思维构架，更需要严谨、扎实的史料功底作为这一构架的支撑。一种不囿于成见、不人云亦云，敢于疑他兼之疑己的思维活力，洋溢于《史事考》全书之中。作者在研读有关义和团运动史的论著时，总是细心审视其所述史事有无史料根据，对其所引证的史料进行原件查核及其可靠性、真实性的检验，进而分析各种史料对同一史实的描述是否矛盾，以及一批流行的史学观点能不能经由这些史料得出合乎逻辑的说明。这是一项对既成研究成果进行重新评估的思维工程。作者审视所及，包括了迄今发现的反映义和团运动史的大批电文、奏稿、上谕、书信、笔记、报刊、方志、揭贴、口碑等史料记载。正是丰富多样的史料活跃了作者的研究思路，使他有可能在批判地吸收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学界的一批几成定论但并不完全反映历史原貌的观点提出质疑，严密地层层辨析，谨慎地提出修正。该书的评估或质疑，至少涉及了海内外 26 位研究者的 87 种著作或论文，其中包括了一批具有相当权威性的中国近代史或义和团运动史的著述。

以史料为基石的思维活力，并不意味着思维的随意性，判断的主观性。恰恰相反，这要求考据者将怀疑精神和严密审识结合在一起。《史事考》的作者坚决反对史学界某些有失偏颇的研究倾向，以及为了说明某一论点，而有意无意地主观性处理史料，断章取义，张冠李戴的作法。比如迄今研究义和团运动的大多数著述，出于对民众运动的真诚歌颂，往往用不够完整的材料来论证天津之战中抗击侵略者的主力是拳民组织，但也有个别论者对义和团的作用不屑一提，《史事考》则运用了 25 种比较可靠的中外档案文件，经过对天津战役的各次战斗、各个阶段和各方面力量的严密考证、具体分析，得出了如本文前面介绍的认为该战役系以清军为主力的新观点。

在历史研究中，往往会遇到令人遗憾的史料空白。这种现象，或者是现有史料发掘之不足，或者是当年就没有留下甚至是早已销毁了史有明证的记载。如义和团运动中清王朝的高层集团在极小范围内的一些机密决策，已几无史料可考。正象荣禄所云：“当时宣战降旨情形，事属密勿，非外间所能探悉”（《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 931 页）。恰恰是这类“宫廷秘闻”，最容易引起后人的浓厚兴趣，多年来评论纷纭，但由于无法窥见其深层背景而很容易流于臆测。《史事考》在考察这类难题时，谨慎地使用了“假说”或“存疑”这两种方法。所谓“假说”，就是在缺乏足够根据的条件下，将现有的、较为可信的史料放在特定的背景下加以考析，从而对其反映的历史现象，作出符合逻辑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是经得起检验的推断。该书最出色的“假说”，是对慈禧攻打使馆的动因考析。作者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曾拘留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人的往事同义和团战争中有的谋臣提出的“生擒”使臣、“挟以为质”的奏请进行对比，并进而详细研究了清军围攻使馆时尽力避免伤亡外国人的火力布置和战术细节，指出使馆之役，很像

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王朝企图以人质挟制谈判的故伎重演。应当讲，作者的这种推断是严肃而合乎逻辑的。这对清政府为什么要派亲信的武卫军为战斗主力，又为什么攻得时松时紧、当克不克等复杂现象，提供了可供解释的前提，既开阔了研究思路，也为同行的继续探索留下了余地。他的见解被有的国外学者称作“极为富有魅力”，是不为过誉的。

《史事考》的价值，不仅仅限于对义和团运动史中若干复杂现象的重新分析，更重要的问题，也许在于它有助于读者进一步认识考据学在近代史研究中应有的位置，并且在考据方法论上给予同行们以相当启示。

作者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体认，充分肯定了史实的客观性和可知性。他认为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尽可能完整、真实地展现历史原貌，以便为现实提供必要的经验与借鉴。诚然，特定的历史过程一去不再复返，而且也不可能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使之重现，但是现存的大量人文传承物和传承方式，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人间所经历过的沧桑，而文字记载则更是人类文明史的主要的和比较详尽的表达方式。因此，如《史事考》那样对文字记载进行爬梳、整理、校勘和诠释——即通常所说的考据——是研究者尽可能靠近历史真实的重要手段。如果不弄清一件件具体的历史事实，不从事微观的、个案的研究，即使是具有良好理论素质的历史学家，也不可能对历史过程及其规律作出正确的总体把握和宏观概括。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考据学所包含的积极因素，诸如敢于质疑、重视实证、严密审识、反对空谈等精神和方法，在今天不仅仍是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前提，也是检验研究者功力之高下的重要标准。

通过《史事考》可以发现，作者在继承和转换考据学传统方面作了可贵的尝试。这首先表现为他对史料观的某种更新。近代以来史学界一种颇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将史料称为“第一手史料”（或“原始史料”，如公文档案、会议记录、书信、日记、回忆录等）和“第二手史料”（有别于前类的其他史实记载）。这种分类法的缺陷似在界定的不够明晰，不能涵盖史料的复杂性、多样性，并在实际运用时容易造成技术评定标准和价值评定标准的混同。特别是一些初入史林的学者，可能出于对一手史料的技术确认而偏信其内容的直接性和可靠性。《史事考》一书在鉴别和使用史料时另辟蹊径，提出了一种新的史料分类法，即以直接反映历史事实的史料为“原始史料”，间接反映历史事实但有明确来源的史料为“派生史料”，没有明确来源的史料为“无根史料”。这种分类法的长处，是把对史料的技术鉴定和初步的资格审核结合在一起，而在两者之中更重视对史料资格的具体分析。比如在原来是被笼统界定为一手史料的文书档案中，就可能存在颇为复杂的史料类型，既有直接反映史实的原始史料、经过转述的派生史料，也可能掺杂有来自传闻的无根史料。这样，如果把凡是能提供一定史实信息的文字组合看作史料的话，那末它们的价值就不仅仅表现为某种特定的记载方式，还要分辨其在各该形式中所占据的史料资格：能够直接反映史实的史料，可以是一个作为整体的文献，也可以是其中的某个部份，甚至可以是一两句文字。《史事考》全书贯穿的这种对于史料的可弹性理解，有助于我们更深入更灵活地利用历史文献，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误信误用。

史料的直接性并不等同于史料的真实性。两者之间的差距，同史料记载者（或编纂者）的主观倾向密切相关。因为包括原始史料在内的一切史料，都是特定史实和史实记载者的特定心态发生交互作用的产物。它们不仅反映史实记载者的动机、立场和态度，也不同程度地折射出记载者内心世界中诸如情绪情感、思维方式、价值尺度等更深层的文化心理因素。这样，即使是同一个特定史实，也常常依记载者的主观倾向而表现为众说纷纭乃至互相矛盾的史料。《史事

考》一个突出的特色，是相当重视史料记载者的角色身份，善于通过他们的动机、需要、立场和观点，从各具不同倾向的史料中，考证出反映历史真实的内容。作者的考据成果表明，即使是主观性很强的史料，也可以从反方向挑选出其中可信的部分。比如，一道火急求援的电报，对敌手的实力决不至于缩小；一件仇视拳民的奏折，其肯定拳民行为的部分则不至于夸大。而对那些同记载者强烈的主观倾向相一致的内容，作者也并未轻易否定，而将其同其他史料对照分析，清理出其中真实的成分。对史料中模糊的用语、含混的表述，则在考核中澄清原义，确认所指，分别处理。

顺便说到的是，史料的真实性也是相对的。这不仅是由于新史料的继续开掘会修正我们对某些现有史料的认识，而且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宽和深化，也可以对同一件史料作出多角度的价值评判。比如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深重的人祸天灾，造成了一种“讹言横兴”、“怪诞支离”的社会景观。这种大量反映在文书揭帖、时人笔记中的蜚语流言，对于政治史、军事史而言自然是无根的和非真实的史料，但在作为义和团运动母体的乡土文化、民间习俗领域，它们却相当真实地体现了当时老百姓对于社会、自然和超自然的认知和判断，反映了存在于底层社会的生动复杂的观念世界。详尽地爬梳、校订和辨析这类史料，对于研究中国民众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心理轨迹和特定回应，将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把论题回到本文的开头。当前近代史研究中出现的某些不如人意的现象虽然有多种原因，但有些研究者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年轻的同行，学风之不够严谨，功底之不够扎实，恐怕或多或少地同缺乏基本的考据训练有关。一些史作或追求观点的新异，或专事史料的猎奇，下笔万言，概念重重翻新，内容见所未见，却很少顾及这类概念和“史料”能否经得起历史事实的验证。史学工作者需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并吸收相关学科的成果来及时调整观察历史事件的视角，但历史的基本事实却不会由于观察工具的更新而发生变化；史学著作应当写得新鲜活泼、引人入胜，但无影无根的奇闻逸事，却不能增添历史场景的色彩。《史事考》的作者已经用自己的研究实践证明了考据传统作为史学方法论的可行性和优越性，也指出了倡扬科学的研究态度和严肃的学术作风的迫切性。“宁可少些，但要精些”——这是我们对《史事考》的一点读后感。